

边陵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迦陵文集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前言

1927年6月2日，中国近世一位杰出的学者王静安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湖水中自沉身死。他死后给我们留下了两则难以解答的疑问：一则是他早期治学之途径，乃是致力于西方哲学及文学之研究，而其后期治学之途径，则转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考证研究，其转变之原因究竟何在？另一则是他以五十一岁的盛年，学术研究之事业正当如日中天的时候，何故遽尔轻生，竟决然走上了自杀的途径，其内心所蕴蓄的自杀因素，又究竟何在？关于这两则疑问，自静安先生逝世以来，也曾有人做过不少分析和解释，然而那些纷纭歧异的说法，迄不能予人以完全满意的答复，而且读了后，反会使人有弥增困惑之感。其所以如此者，大约有以下数种原因：第一，因为静安先生乃是死于一个政治环境非常复杂的时代，其同时之人，有的因政治

立场之不同，遂各以一己之私见发为种种异说，有的则又因个人有所顾忌，而不肯做明白的分析。这是使这两点疑问不能得到明白解答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时代较晚的人，则又因为对于当时促使静安先生改变其治学途径及致静安先生于死的复杂环境已经有所隔膜，因而不能有切实深刻的体认，同时又因为尊重静安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不愿以政治背景损害其超然的学术地位，因此乃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有意避而不谈。这是使这两点疑问不能得到明白解答的第二个原因。第三，因为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及其自沉以死，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理想和意志，因此如果不能对静安先生之性格及为人有正确而深入的了解，自其内心做设身处地的分析和思索，那便即使认清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依然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核心。这是使这两则疑问不能得到明白解答的第三个原因。静安先生在其所著之《人间词话》一书中，于论及诗人之修养时，曾经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后来俞平伯为重印《人间词话》写序，曾经引申这两句话的意思说：“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而我们要想解答静安先生身后所留给我们的两则令人困惑的疑问，便恰好也正需要有这种能够“入乎局中”，又能够“出乎局外”的两种工夫。在静安先生方一逝世时，当时之人因不能摆脱政治立场的拘束和顾忌，遂不免各以一己利害之私见发言立说，其病乃在于不能“出”。至于时代较晚之人，则对于当时复杂的背景既然已经有所隔膜，而且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为人，以及他所欲追求持守的理想与道德之价值标准，也因时代文化之不同，而不复能有切实深刻的体认，其病乃在于不能“入”。所以要想解答这两则疑问，第一我们便该先具有不为政治私见所拘束的客观的态度，第二我们便该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及其时代，都有切实深刻的体认和

了解。如此也许我们方可以为这两则使人困惑了将近半世纪之久的疑问，求得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本文写作之目的，便是想以静安先生之性格及其所生之时代做为两条主要的线索，不掺杂任何政治私见，尝试着以静安先生之心为心，来做一种还原式的探索。更希望借着静安先生的个例，能使读者对于生于文化激变之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矛盾痛苦之原因，能有较为深刻的体认。因此而知所反省、知所警惕，从而避免相类似的悲剧再行发生。那么我们所做的这种探讨的工作，就不是无益的徒劳了。

11-15

迦陵文集

- 第一卷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 第二卷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 第三卷 迦陵论诗丛稿
- 第四卷 迦陵论词丛稿
- 第五卷 唐宋词名家论稿
- 第六卷 清词丛论
- 第七卷 古典诗词讲演集
- 第八卷 汉魏六朝诗讲录
- 第九卷 唐宋词十七讲
- 第十卷 我的诗词道路

特约编辑 谢景林

张国岚

责任编辑 王亚民

邓子平

封面设计 刘 峥

目 录

第一编 王国维的生平

第一章 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	(3)
一、静安先生之性格	(3)
(一)知与情兼胜的禀赋	(3)
(二)忧郁悲观的天性	(9)
(三)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	(13)
二、时代对于静安先生之影响	(18)
(一)静安先生早年读书之志趣及时代变乱 对其所产生的第一度影响	(20)
(二)时代变乱对其治学途径所产生的第二度影响	(33)
第二章 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	(49)
——王国维死因之探讨	
一、自沉之经过及关于其自沉原因的 几种不同说法	(49)
二、静安先生与罗振玉之关系	(55)
三、静安先生与清室之关系	(62)

四、静安先生与民国政府之关系及其真正之死因·····	(73)
五、余 论·····	(86)

第二编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序 论·····	(107)
一、静安先生的两组文学批评及其重要性·····	(107)
二、中国文学批评之传统及其需要外来之 刺激为拓展的必然性·····	(113)
三、晚清时代静安先生在西方文化刺激下的觉醒·····	(120)
第二章 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	(129)
一、早期杂文中所表现的有关文学批评的 几点概念·····	(129)
二、形成此几点概念的重要因素·····	(146)
三、对《〈红楼梦〉评论》一文的评析·····	(154)
(一)《〈红楼梦〉评论》之写作时代 及其内容主旨·····	(154)
(二)《〈红楼梦〉评论》一文之长处 与缺点之所在·····	(158)
(三)对《〈红楼梦〉》本身之意义与价值的探讨·····	(163)
(四)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一文致误之主因·····	(175)
第三章 《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	(185)
一、《人间词话》之基本理论——境界说·····	(185)
(一)对“境界”一词之义界的探讨·····	(185)
(二)有关境界的一些其他问题·····	(197)
二、自批评之实践中所归纳出的一些重要理论·····	(217)
(一)关于“隔”与“不隔”的问题·····	(217)
(二)关于代字、隶事及游词的问题·····	(225)
(三)关于文学演进之历史观·····	(231)

(四) 关于创作者所当具之修养与态度	(239)
(五) 关于《人间词话》的评赏态度及评说方式	(247)
三、余论——《人间词话》境界说与	
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	(278)
(一) 严沧浪以禅悟为喻的兴趣说	(280)
(二) 兴趣之义界——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	(283)
(三) 王阮亭的神韵说及其与兴趣说之关系	(287)
(四) 神韵说与兴趣说的主要分歧	(290)
(五) 境界说与兴趣说及神韵说之比较	(295)
(六) 三种诗说产生之时代背景及	
时代与诗论之关系	(298)
(七) 中西诗论之比较及今后所当开拓的途径	(300)

附 录

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	(317)
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	(325)
——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	
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397)
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	(405)
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	
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	(412)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补跋	(467)

第一编

王国维的生平

第一章 从性格与时代

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

一、静安先生之性格

(一) 知与情兼胜的禀赋

在静安先生的性格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一点，乃是他的“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这种禀赋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为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天才；可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则这种禀赋却不幸而使他深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痛苦中而无以自拔，终至成为一个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悲剧人物。静安先生对于他自己之具有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性格也早有反省的认识，在其早期所写的《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就曾自我分析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又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又说：“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而除去自序中所提到的在为学方面感到的“知”与“情”之矛盾

以外，他在诗词中表现出来的整个生活中的矛盾痛苦则更为深切。如其《六月二十七日宿陕石》一诗云：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试问何乡堪着我？欲寻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鼯声四起斗离离。^②

从这首诗来看，他在生活与求知上所感到的彷徨困惑的悲哀乃是显然可见的。此外如其《天寒》一首之“只分杨朱叹歧路，不应阮籍哭穷途。穷途回驾元非失，歧路亡羊信可吁。”^③及《病中即事》一首之“拟随桑户游方外，未免杨朱泣路歧”^④诸句，便也都是借用杨朱之泣路歧的一则故事，来表现他在人生之途上陷于矛盾之抉择的痛苦。而他著名的二句词，《蝶恋花》一首之“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⑤，当然更是他内心之矛盾痛苦的一幅极好的写照。静安先生一生的为学与为人，可以说就是徘徊于“求其可爱”与“求其可信”及人生之途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的追寻与抉择之中。

我们先从他为学的一方面来看。在这一方面因为他所面对的只是单纯的学问，所以不论其为偏重感情的对于“可爱”的追寻，或偏重理性的对于“可信”的追寻，虽然因出发点之不同，在其开始择别途径时，也许不免有一度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争战，可是既经择定之后，他却往往能以其感性与知性兼美的天才相辅为用，而反而得到了过人的成就。当他早期从事于文哲之学的时候，可以说乃是从感情出发的对于“可爱”的追寻，可是我们试一看，当他为叔本华悲观哲学所吸引而对之倾倒耽溺时，他所写的有关叔本华的论文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及《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却都是站在客观立场，以理性的思

辨对其学说之是否“可信”来做的批判和分析。而当他耽溺于词之写作时，他也曾同时从事于词之批评及词籍之整理，既写成了一部《人间词话》，也完成了一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静安先生在从感情出发对于“可爱”者加以追寻时，他同时却也正以其理性在“可爱”之中做着“可信”的追求。这正是静安先生在文哲之学的研究中，既表现有锐敏的感受，又表现有精辟之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知与情兼胜的禀赋，即使当静安先生之治学途径自文哲之学转为考证之学以后，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考证之学原来应该是完全基于理性的对于“可信”的寻求了，可是静安先生在考证之学上能有过人之成就的原因，却不仅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见的精严的理性的思辨而已。因为精严的考证推理的工作，尚属一般博学勤力的学者都能达致的境界，而静安先生在学术方面的创获，却更有超越于精严之考证以外者。缪钺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即曾云：“其心中如具灵光，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⑧而给他的考证之学上投以睿智之灵光，使其不断有惊人之发明和创见的，则是由于他所禀赋的近于诗人的感性和资质，以及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一种理想。我这样说也许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在静安先生的考证著述中，这种隐含的资质和心意，乃是颇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静安先生在考证之学上，所用的方法虽是理性的，可是触发他能有惊人之发明与创见的，却往往乃是由于他所禀赋的一种属于感性的直观与想象之能力。举例而言，其在《观堂集林》卷一《肃霜涤场说》一文中，静安先生曾以双声联绵字来解释《诗经·豳风·七月》一篇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二语，以为乃“肃爽”及“涤荡”之意，引证了十余种以上的古籍来做为他的说法的佐证，是一篇全以理性组织的精严的考证文字。可是在篇末他

却叙述这种灵感的获得乃全得之于直观的感受，他说：

癸亥之岁，余再来京师，离南方之卑湿，乐北土之爽垲。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叶尽脱，因会得“肃霜”“淅场”二语之妙，因为之说云。^⑦

又如其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序》一文中，曾经记叙说：

甲寅岁暮，国维侨居日本，为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墟书契考释后序》，略述三百年来小学盛衰。嘉兴沈子培方伯（沈曾植）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也。然国维实未尝从事于此（按：《观堂别集》亦录此序，本句作“余于此学殊无所得”），惟往读昔贤书，颇怪自来讲古音者详于叠韵而忽于双声。……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以此愿质之方伯。……又请业曰：“其以叠韵说诂训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则与其谓古韵明而诂训通，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诂训通欤？”方伯曰：“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维大惊，且自喜亿之中也。^⑧

对于一种“未尝从事”“殊无所得”的学问，居然能于短期的观察研究之后，以臆想而直探古声韵与诂训之学的重要关键所在，静安先生直观与想象能力之过人于此可见。这也才正是他在考证之学方面并非抱残守缺，而能自辟蹊径、卓然独往的真正原因所在。在他的考证专著中，时时闪现出这种灵光的作品甚多，而其中最可引为代表的一篇伟大著作，则是他以古器物古文字来考证古史所写出的《殷周制度论》，赵斐云先生曾推许之云：“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⑨这种推崇，一点

也不是溢美。在这篇著作中，静安先生以其过人之直观与想象的能力来观察和组织，使得一些早已死亡的支离破碎的材料，都在他的灵光照射下，像重新获得了生命一般地复活起来。这种成就，当然决不是仅靠精严的理性便可达致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他在理性的考证之外，所流露出的对于周代之文物制度的一种怀思向往之情，而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理想。在这篇著作的结尾中，他曾经极有深意的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世帝王之所能梦见也。

又说：

如是则知所以驱革窃奸宄相为敌仇之民，而跻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⑨

如果我们想到静安先生写作本文时军阀混战、政党相争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静安先生在新旧文化制度变革之际，其感慨世乱、缅怀先哲的感情，乃是显然可见的。一般人只知道静安先生的考证之学乃是纯理性的由古文字声韵及古器物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然而侯外庐在其所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就曾经

说：“然而‘明立制之所以然’则并不是他的研究中心，因为他有他的理想与信仰。”^⑧这话乃是可信的。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一文中，曾经记述他有一次向静安先生问学的事，他说：

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⑨

观乎此，则静安先生的考证之学，其目的原不仅为考证一事一物，而别有更高远之目的与理想可知。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要对此一点特加说明的原故，乃是因为此一点不仅可证明静安先生乃是一位知与情兼胜的天才，而同时也是造成他后来研究途径转变之一项重大因素。总之，知与情兼胜的禀赋，无论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方面，或在其晚期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曾使他的研究成果闪放出异样的光采。这正是静安先生的过人独到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他为人方面来看，则同样的禀赋却造成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深陷于感情与理智之矛盾的终生痛苦。因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只是单纯的学问而已，而现实生活的对象则是复杂而多变的人世。学问可以由一己之意愿来取舍和处理，可是人世的纠纷则无法由一己之意愿来加以解决。静安先生既以其深挚的感情对于周围的人世有着一种不能自己的关怀，又以其明察的理智对于周围的罪恶痛苦有着洞然深入的观照，于是遂不免在现实生活中常徘徊于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矛盾痛苦之中。更何况静安先生所生之时代，正值中国之文化与政治都面临新旧激变之时。本来激变之时代就足以形成一种认同混乱的彷徨困惑，而更加之以当时的军阀政客又利用此变乱之时代互相争攘以各谋私